

## 第三章 法西斯殖民统治 与军事镇压

### 一、关东军是伪满洲国的 最高统治者

#### 1 “内部统辖”

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洲国的统治，采取了两面手法：在外观上保持“独立国家”的形态，在内部严行控制。而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的总代表——关东军，则是这种统治政策的执行者。

如前所述，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的第二天，即与关东军司令官签订密约，规定伪满参议府的参议和“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也要任用日本人，“而其人物之选定委诸贵军司令官之同意。”<sup>①</sup>两天之后，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日本内阁作出两项决议：一是所谓《中国问题处理方针要纲》，规定在伪满洲国“要使日本人成为领导骨干”，并在第七项内写道“为了贯彻帝国有关满蒙政策，必须迅速设置统制机关。但在目前应维持现状。”<sup>②</sup>二是所谓《满蒙新国家成立后对外关系处理要纲》，顾名思义，这是一项关于涉外问题的决定，但在第六项中也写道：“为了在外交上和

① 满铁经调会：《满洲国关系条约集》，打印本，第10页。

② 《现代史资料》，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一九七二年版，第494页。

内政上掌握实权，最初应尽可能使之采用少数日本人作为官吏或顾问，并逐步地加以充实。”<sup>①</sup>当时，日本帝国主义除了积极武装占领全东北之外，急于控制东北的经济命脉。因此，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日本内阁又做出了《关于帝国对满蒙新国家的具体援助和指导问题》的决议，使令伪满聘任有权威的日本顾问作为财经问题和一般政治问题的最高指导者；使令伪满参议府、中央银行以及其他机构任用居于领导地位的日本人。<sup>②</sup>

这一切说明，通过向伪满政府派任日本人官吏或顾问来控制伪满洲国统治大权，已是日本帝国主义确定不移的国策。不过，在体制上如何体现，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一九三二年四、五月间，由于国联调查团的来临，不便于解决此类问题。但是，私下进行的酝酿和策划，并未停止。一九三二年六月，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炮制了一个所谓《指导满洲国纲要（草案）》，提出一整套统治伪满洲国的办法。其方针是：“支持满洲国并使之发展成为适应我国国策的独立国家。”即伪满洲国这个“独立国家”，要服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国策。具体做法是：“为实行帝国对满洲国的国策，不特别设立文治机关，专使关东军担当其任；实施中，努力保持新国家为一独立国的体面，而在满洲国名义下通过日本人系统的官吏，特别是通过总务长官以求实现。”桥本还提出，当日本公开承认伪满洲国之后，“则改组或废除旧有我国行政官署，在关东军司令部内设置驻满政治指导机关，由关东军司令官承担对满洲国政府的指导；此外，关于外交手续，则由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使领事等为其下属，掌管外交事务；关东军司令官仍然保留关于满洲国日系高级人事的决定权。”<sup>③</sup>关东军的这套主

① 《现代史资料》，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一九七二年版，第495页。

②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存，打字件。

③ 《现代史资料》，续·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一九六五年版，第640—641页。

张，日本政府全部采纳。不过，一直拖了一年之后，即一九三三年八月八日，日本内阁才正式作出规定日本对满政策基调的所谓《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亦称“八·八决议”。这个决议与桥本的方案不同之处在于，把“适应”日本国策的“独立国家”，修改为“与大日本帝国有着不可分的关系的独立国家”。看来，日本内阁的决议到底比桥本的方案高出一筹。当然，尽人皆知，所谓独立国家是假，与日本不可分，彻底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附属国、殖民地是真。这个由十四个项目构成的《要纲》是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伪满洲国的纲领，它明确规定了对伪满洲国的国体、军队、经济、财政等各方面的控制政策。关于控制伪满的体制与机构，《要纲》写道：“对满洲国的指导，在现行体制下，在关东军司令官兼帝国驻满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籍官吏实际进行。”“为便于其统制，使之维持以总务厅为中心的现行体制。”<sup>①</sup>通过日本政府的这一“极密”文件，使我们清楚看到：第一，关东军司令官是名副其实的伪满洲国的最高统治者，它对整个伪满实行“内部统辖”；第二，实际控制工作主要通过日籍官吏进行，这就修改了伪满政权建立初期确定的通过日本人参议进行“内部指导”的方针；第三，建立了伪满洲国实际的政治行政中心，也就是说，在伪满洲国，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构成了一个政治统治的金字塔，关东军司令官是最高峰，他才是主宰伪满洲国、踞于伪满皇帝头上的太上皇。

## 2 “四头政治”的统一

日本内阁作出“八·八决议”的前一年，恰好是一九三二年

<sup>①</sup> 《现代史资料》，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一九七二年版，第589—590页。

八月八日，武藤信义大将接替本庄繁充任关东军司令官时，就已经受命兼任“驻满全权大使”和关东长官。这种三位一体制的实施，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和拼凑傀儡政权之后，为了加强对伪满洲国的控制，力谋统一它在我国东北的“四头政治”这种分立局面。

所谓四头政治，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从事侵略扩张的四个系统和机构。这就是：

(一) 关东厅。一九〇五年十月十八日，作为战胜沙俄后实行军政统治的殖民机关，在辽阳设立了关东总督府，后迁至旅顺。一九〇六年九月一日改称关东都督府。这是一个军事、政务统一的殖民统治机构。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三日，撤销关东都督府，代之以关东厅，从此军政分离。关东厅及其前身关东都督府不只是关东州的殖民统治机构，而且在南满，特别是在满铁附属地还行使司法权。另外，它对满铁拥有监督权。特别是都督府时期，是对我东北实行军事、政治侵略的中枢。

(二) 关东军司令部。日俄战争时期的满洲军总司令部，关东都督府时期成为该府的陆军部，一九一九年都督府撤销，关东厅成立时，独立为关东军司令部。其任务，名义上是防卫关东州，保护南满铁路，实际上在我国东北全面进行武装干涉和军事侵略。关东军司令部统率的兵力，“九·一八”事变前为一个师团和六个独立守备大队。每个独立守备大队九百人，六个大队共五千四百人，加上常驻的一个师团五千人，总共一万零四百人。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旅顺，师团和守备队司令部分别设在辽阳和公主岭。

(三) 领事馆。“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日本总领事馆有四处，即哈尔滨、吉林、间岛（即延吉）与奉天（即沈阳）；领事馆有八处，即齐齐哈尔、长春、安东（即丹东）、铁岭、郑家屯、

辽阳、牛庄与赤峰。此外还有三处领事馆分馆，即农安、通化、海龙。这些领事馆除了进行外交活动外，还行使领事裁判权。同时，在十八个城镇设有领事馆掌管的日本外务省系统的警察机构，它和关东厅设在满铁附属地的警察不同，主要在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之外进行活动。

（四）满铁。它名义上是经营从沙俄手中继承过来的南满铁路，实际上是全面推行日本帝国主义大陆侵略政策的工具。在日本政府的直接指挥下，以铁路、矿山为中心，全面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侵略活动。满铁还以附属地为名，在铁路沿线和各车站霸占大片中国领土，排斥中国主权，非法行使行政权，实行殖民统治。

这四个机构和系统，分别受日本内阁和外务、拓务、陆军等省管辖和监督，在侵略我国东北过程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干了许多使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坏事。自然，它们之间，为了争权夺利，也难免摩擦和齟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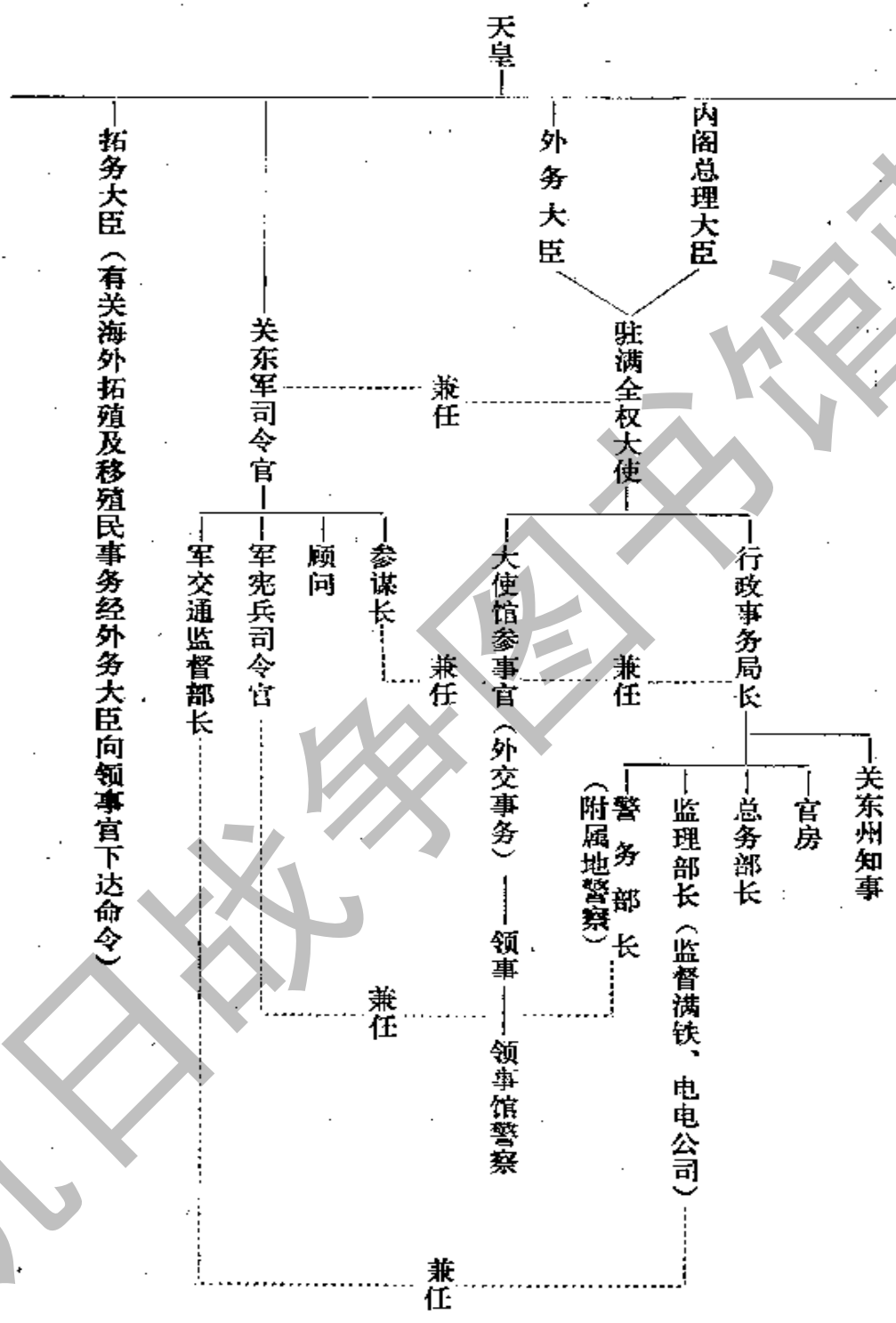
“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政权业经成立，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便于集中进行殖民统治，开始进行所谓“在满机构的改革”，试图统一“四头政治”。关东军自然最为主动和积极。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日本政府虽然已经发令使关东军司令官身兼三职，但“四头政治”的局面，尚未根本解决。关东军为实现其对伪满洲国的一元化殖民统治，首先试图全面改组拥有巨大经济势力和政治特权的满铁。一九三二年九月，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向满铁理事、经调会委员长十河信二提出了题为《满铁按业种分割，设立大投资公司》的函件。一九三三年七月，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向满铁总裁林博太郎提出要求，在八月末以前，根据三月发表的《经济建设纲要》，草拟好满铁改组实施方案。关东军提出改组满铁，目的是把满铁改变为纯粹的事业公司。具体来说就

是：按业种将满铁事业加以分割，使之便于统辖；代替满铁设立持股公司，以便动员日本内地资本；合并满铁经调会，扩大关东军特务部，使之成为可称得上是经济参谋本部的幕僚部。但是，关东军的主张遭到满铁和日本垄断资本的反对。小矶向十河提出函件时，满铁经调会以为时尚早为辞，予以拒绝；关东军司令官提出要求时，满铁首脑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在满洲引进资本，除由满铁承担之外，别无他途。这样，整个满铁公司和社会舆论，均激烈反对。关东军的主张，一时无法实现。<sup>①</sup>

一九三四年七月八日，冈田启介内阁代替斋藤实内阁。经过陆军、外务和拓务等部门的紧张磋商，终于在当年九月十四日由内阁会议作出决定，将日本驻满机构改为“二位一体制”，即废除关东长官，在关东州设置敕任级州知事；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大使；关于外交事务，在外务大臣的命令监督下，设事务机构参事官；赋予驻满大使以行政监督权，即对满铁、电电公司、关东州知事、铁路附属地行政等的监督权，但行使该权利时，受内阁总理大臣的监督。同时，在日本内阁设立对满事务局，事务局总裁由陆军大臣兼任，日本有关各省的局长参加事务局的参与会议。至此，“四头政治”遂告统一。

日本在满机构的改革和“四头政治”的统一，实质上是日本统治集团内统治权力的再分配。其结果在对满洲国的殖民主义统治上，还是“陆军中心主义”占着上风。这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国主义化和走上军事侵略道路的必然结果。根据此次改革，如下图所示，关东军司令官兼任全权大使；关东军参谋长兼任行政事务局长，而行政事务局长又兼任大使馆参事官；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兼任警务部长；关东军交通监理部长兼任监理部长。此外，

<sup>①</sup> 参照《片仓衷回忆的满洲国》，经济往来社，一九七八年版，第195页。



对满事务局总裁和次长，又都以现役陆军武官充任。因此，所谓日本驻满大使馆和关东军司令部，不过是一个实体的两个名称而已。伪满洲国存在的十四年间，实质上无非是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的十四年。

日本统治当局在统一“四头政治”过程中，之所以把“三位一体”改为“二位一体”，给关东军司令官保留一个驻满大使的兼职，不外是考虑需要顾全伪满洲国“独立国家”的自欺欺人的外貌。这一点，日本的一件题为《帝国在满洲国政务机关的调整问题》的绝密文件写得十分清楚：“目前，实质上，日本把满洲国的铁路、经济、政治、军事和其他一切方面当作高于保护国地位的性质加以处理，作为满洲国的独立形态而唯一保留下来的，只是在满洲国和日本之间交换外交官而已。如果把这块唯一的独立国的招牌取了下来，那么，就无法承认我国的国策是把满洲国当作独立国家而建立起来的。”<sup>①</sup>

### 3 太上皇与傀儡

关东军对伪满洲国的控制，首先表现在对伪满皇帝溥仪的关系上。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伪满洲国实行帝制时所颁布的《组织法》中，虽然规定：“满洲帝国由皇帝进行统治”。<sup>②</sup>即由皇帝统揽统治权，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均归属皇帝；皇帝还统率陆、海、空军，颁布“紧急训令”，掌握大赦、特赦等权。但是，实际掌握统治大权的不是溥仪，而是皇帝之上的太上皇，即关东军司

①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84—85页。

② 伪《组织法》分六章三十七条，后改为三十九条。这一规定见该法第一章。



令官——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的总代表。关东军司令官为了充分控制皇帝溥仪，极力夺取盘踞皇帝头上的法皇的地位。虽然在明文上没有获得这个规定，但它却俨然以太上皇自居，并且确实是这样干的。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关东军司令部炮制一篇题为《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和协和会的本质》的文章，其中第三项是专门阐述“天皇、军司令官和皇帝之间的关系”的，说“满洲国皇帝基于天意，即天皇之圣意而即位，因此，必须为皇道联邦的中心——天皇服务，以天皇之圣意为己心，以此作为即位的条件。”在这里，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求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出卖领土主权，而且出卖自己的全部灵魂。文章给溥仪与日本天皇之间的关系，规定为“宛如月亮凭借着太阳的光芒而散发光辉一样。”如果溥仪不遵从这种关系，“不以天皇之圣意为己意时”，文章威胁说：“则将立即丧失其地位。”这就是说，溥仪如不百依百顺，随时都会垮台。那么，日本天皇的所谓圣意如何体现又由谁来执行呢？文章明确回答说：“关东军司令官作为天皇的代理人，必须是皇帝的师傅和监护人。”<sup>①</sup>说来道去，溥仪只要一切唯关东军司令官之命是从，就可以稳坐金銮殿，保全皇帝的宝座了。

当然，关东军司令官操纵、控制溥仪，主要还是采取所谓“内部指导”的办法。这并非是对这位清代末帝需要特别关照，而是伪满洲国皇帝这块金字牌匾，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尚有用场，不便摘掉。顾名思义，“内部指导”自然就是外观上尽量使之保持君王的姿态，暗地里则由关东军把持和操纵一切。为此，关东军司令部特设个第四课，专门承担对溥仪和伪满政府进行内部操纵和控制的任任务。此外，对于溥仪，关东军还采取了特别措施，即在他的身边设一名关东军的常驻代表。

<sup>①</sup> 《现代史资料》，续·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一九七二年版，第908—911页。

十四年间，这一特别职务曾经几易其人。<sup>①</sup>但是，一个名叫吉冈安直的日本职业军人任职时间最长，从一九三四年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投降为止。从此人十年间在溥仪身边的所作所为，可以窥见关东军在控制和操纵溥仪上也是煞费苦心的。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吉冈作为驻天津日本侵略军的一名下级军官的时候，就与溥仪相识。后来，他回到日本任职，又同在日本学习的溥杰交往。吉冈与废帝溥仪弟兄如此热心攀结，其用心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他的一再努力也不无结果。吉冈之所以能促使日本统治当局派他充当这个美差，恐怕也和他竭力吹嘘同溥仪的交往有关。吉冈被派在溥仪身旁，既非盖世太保，只监视言行，亦非单纯充当关东军司令官与溥仪之间的联络员，其主要任务是，指导并支配伪帝溥仪按照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加紧侵略、掠夺的调子大唱傀儡戏。因此，吉冈在政治舞台上虽然不能出头露面，但并不妨碍他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十年之内，他从一名普通中佐，很快跃升为陆军中将。但是，堂堂一位将军，在关东军司令部里却只虚兼参谋或第四课课附的职务，而且长期驻在伪满帝室，却无一个正式头衔，足见这种差事确实有些古怪和特别。直到一九四〇年才设计出“皇室御用挂”这样一个头衔给吉冈戴上。用汉语来说，“御用挂”就是替皇帝办事之人的意思。然而，事实恰好相反，不是吉冈替溥仪办事，而是溥仪替吉冈办事，替关东军司令官办事，替日本帝国主义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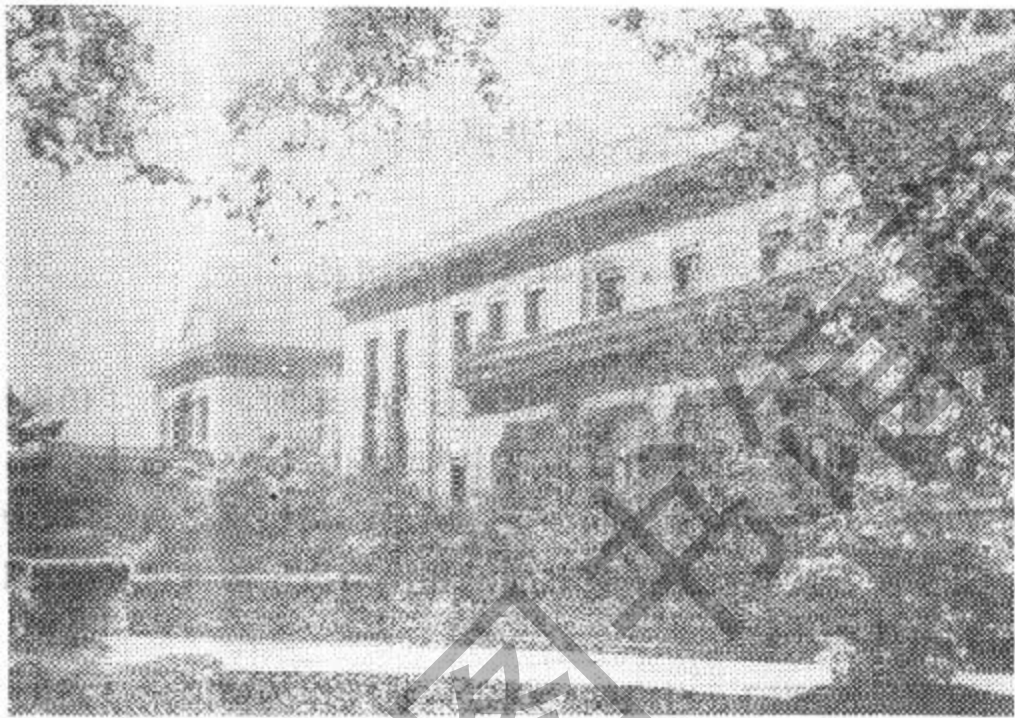
吉冈阴险狡猾、专横跋扈，但不能把这一切看成是他个人品质的表现。有时候，他对溥仪及其一家殷勤、关照，连溥仪给家父汇款、弟弟结婚的私事都慨然相助，甚至低三下四地称自己是“皇帝的脚指头”；但是，骤然翻脸便以“军的意旨”“关东军参谋

<sup>①</sup> 在吉冈之前有上角利一、中岛比多吉、石凡志都磨等人，任期均为一年左右。

会议的决定”相要挟，傲慢地把溥仪比作“我的孩子。”吉冈还善于离间，说什么“满族人可靠，汉族人是靠不住的”，“唯有‘满洲皇帝’才是真正理解‘一德一心’的真谛的唯一个中人。”吉冈大搞这种愚弄和恫嚇交替使用的恩威并施战术，目的只有一个，即迫使溥仪服服贴贴地随其摆布。正如溥仪自己所说的：“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概听他的吩咐。我要说的话，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的。”<sup>①</sup>在狠狠抓住溥仪这一点上，吉冈对于他的上级——日本统治当局来说是坚贞不二的。一直到了苏联红军的炮声轰鸣、进军解放东北的时候，他还力排众议，竭力主张把溥仪及其家属都挟持到通化的深山之中，最后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仍不肯放松，非要溥仪丢弃大部分家属到沈阳乘飞机逃往日本不可，直到被苏军捕获，他还以溥仪的“保护者”自居，恬然不耻地要求苏军允许溥仪逃日。后来，在送往苏联的途中，才被迫与溥仪脱离了关系。

和其他帝王宫廷一样，伪满皇帝的宫内府也是一个臃肿庞大的机构。在宫内府大臣和次长之下，设有帝室会计审查局，以及总务处、内务处、掌礼处、侍卫处、皇宫近卫处，等等。处之下还设有课室。宫内府职员共约七百人，其中十分之一为日本人。日本人比例虽然不大，但从宫内府次长到各处、课长，都由日本人占据。就连溥仪的诏书和敕语也都由通晓汉文的佐藤和有关日本人课长来包办。至于掌管“御玺”“国玺”和溥仪敕裁文书的尚书府，情况和宫内府完全一样。溥仪的职权是，每天按照日本人的意旨，在各种文书上画上大大小小的“可”字。溥仪由于阶级地

<sup>①</sup>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354页。



伪 皇 宫 旧 址

位所决定，重登皇帝宝座，不能说不受他的复辟欲望所趋使；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给他戴上皇帝的桂冠，并未使他得以称王称霸，恢复清室祖业。如果说，伪满洲国对广大的中国人民好比一座人间地狱；那么，对于伪皇帝溥仪来说，好比是个紧箍咒。众所周知，在溥仪生活、工作的宫内府里，除了上边所说的“御用挂”之外，还驻有身着特种制服的日本宪兵。凡是往见溥仪的人员，都得预先得到“御用挂”的批准和许可。经他许可随时可以晋见的，只限于溥仪的家属和极少数伪高级官吏。但是，他们的出入行止，宪兵们都要记录，并向“御用挂”按时报告。日本投降，挟持溥仪逃跑时，除吉凶之外，还有一名日本宪兵伍长紧紧跟随。当年的溥仪，连个人的行动自由都没有，又怎能谈得上什么管理国家大事。这也可以说是溥仪自作自受。